

“京味儿”文学的多元形态

付立松

【摘要】“京味儿”是北京地区文化生态蕴育的审美风格。清代北京地区施行旗民分治政策,形成京旗文化、北京民人文化、京师侨寓文化三大形态。除以老舍、叶广岑代表的“京旗”风格外,北京民人的居住区域、生活方式、语言特征与旗人不同,地域书写呈现出独特的“京味儿”风格。民国时期徐剑胆、陆瘦郎的小说聚焦北京外城中下层社会,新时期刘绍棠、浩然表现京郊风土人情的小说也属“京味儿”文学。可以说,多元形态形成了20世纪北京“京味儿”书写的文学谱系。

【关键词】京味儿文学;京旗文化;老舍;徐剑胆;浩然

【作者简介】付立松,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大学京旗文化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当代文坛》(成都),2022.1.42~4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老舍与京旗文学现代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BZW123。

“京味儿”是1980年代兴起的文学概念,其出现、流行与老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有关。1979年老舍遗作《正红旗下》在《人民文学》连载,次年发行单行本,与《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久被尘封的作品一同面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呈现老北京市井风情,震撼习惯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坛,预示北京书写、批评与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982年,舒乙一篇文章提到“京味儿”概念:“老舍著作的一大特点是它们的‘北京味儿’很浓”;“所谓‘北京味儿’,大概是指用经过提炼的普通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①同年,邓友梅的中篇小说《那五》在《北京文学》发表,此后汪曾祺、韩少华、林斤澜、刘心武、刘绍棠、陈建功等为文坛贡献一系列风格相近的作品,俨然成为“京味儿”流派。老舍被奉为“京味儿”文学正宗,“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②。老舍作品展现北京平民阶层日常审美情趣与大众场域的琐碎人生,赋予“京味儿”文学城市的、平民的基本属性。老舍的文学语言令人赞叹。苏叔阳讲:“他把北京话中的精华锤炼成极具特色的文学语言,既有浓烈的京味儿,又合于规

范的汉语语法。……他仿佛做出了一张中国语言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成为京味文学的标杆,以后无论什么人,写出什么时代的京味文学,都只能填写在这张表格的空格中。”^③老舍作品成为衡量北京书写是否够“味儿”的标尺,乃至唯一标尺。当老舍成为北京文化的一张名片,规范“京味儿”文学书写、研究的基本范式,一度与老舍代表的文化并存的文化形态可能被遮蔽;少了并存文化做参照,老舍代表的“京味儿”风格也难彰显独特魅力。分析清代以来北京地区文化形态演变历程,在多元文化形态参照下进入老舍的文学世界,才可能准确体悟老舍代表的“京味儿”风格,丰富“京味儿”文学研究格局。

清代北京施行旗民分治政策,旗人与民人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形成相对独立而彼此联系的京旗文化与北京民人文化。老舍出身于满洲旗人家庭,在京旗社会成长,笔下的松二爷、常四爷、福海、定大爷都是北京旗人;以老舍为标尺衡出的文康、蔡友梅、冷佛、尹箴明、王度庐等“京味儿”作家也是北京旗人。赵园认为:“几百年的文化弥漫与融会,到

清末,旗人文化已难以由北京文化中剥出,旗人则在许多方面正是‘北京人’的标本。”^④刘小萌指出,“举凡带有‘京味’的东西,几乎都渗透着旗人的影响”,“离开旗人的历史与文化,所谓的‘京味’就无从谈起”。^⑤京旗作家以纯粹白话书写北京的文学作品无不带有“京味儿”风格,“京味儿”何种程度上正是“京旗”之“味儿”?有旗便有民。旗民根本区别在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同,旗人隶属八旗,民人隶属省府州县,故有旗籍、民籍之称。北京民人隶属顺天府大兴、宛平、通州、良乡等县,语言特征、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旗人迥异,文化底蕴更为深厚。北京民人以纯粹白话书写本地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同样属于“京味儿”范畴。辛亥巨变打破旗民畛域,北京旗人文化与民人文化在现代启蒙浪潮中沿自我轨迹嬗变、转型,最终融合,地域书写呈现不同的“京味儿”风格。本文尝试以“旗民”视角考察二十世纪北京地区文化生态演变历程,在旗人与民人、城市与乡间、平民与贵族之间发掘久被忽略、压抑的文化传统,构建北京区域文学研究新范式,“是对‘京味儿’文学的纠偏,也是对‘京味儿’文化的丰富,而且是一种具有提升意义的丰富”^⑥,对于当代文学史书写同样不乏启示性。

—

清代北京城有句俗话:“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旗人在“行政隶属、权力义务、经济来源、政治地位、文化习俗等方面有别于民人,就连居住的地域(旗城、旗屯)、占有的土地(旗地),最初也与民人是泾渭分明的。”^⑦北京旗人居居于内城(由宣武、阜成、西直等九门围成,拱卫皇城)、关厢(德胜、朝阳、崇文等城门外驻防旗营)、京西(蓝靛厂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香山健锐营,护卫三山五园)等地,形成以紫禁城、三山五园为核心的京旗文化。晚清旗民界限松动,民人陆续搬入内城,清末内城八旗人口67万,民人约3.5万。^⑧辛亥后,旗人陆续改落民籍,八旗人口锐减,“五四”时期北京居民“旗族占十分之五,回族占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四”^⑨。旗人即使困顿,依然转

徙于内城,“属于左翼东四旗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仍多居住在东城,属于右翼西四旗的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也很少远离其故地。”^⑩北京旗人仍是内城主体族群。老舍笔下人物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于北京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城的六分之一。”^⑪这正是清代正红旗、正黄旗辖区。老舍笔下北京城呈现京旗社会现代转型期的人生百态。赵园讲:“‘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⑫刘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1840-1949》进一步确定“京味儿”特质:“一专门描写北京本地生活和各种人物,二体现出北京特有的文化精神,而最重要的是二者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美学风格。”“北京本地”“北京特有”的“京味儿”风格来自“八旗心象”,京旗文化“对于北京文化风味的构建和重塑,及至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京味’的形成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⑬老舍表现的“人与城”是北京旗人与内城(四九城儿)的精神契合,老舍代表的“京味儿”风格实乃“京旗”之味儿。

“京味儿”文学以轻巧、流利、诙谐的文学语言(北京话)在中国地域书写中独树一帜。老舍的文学语言与曹雪芹、文康、蔡友梅、尹箴明、杨曼青等京旗作家一脉相承,北京旗人语言也有旗下语、旗门语、京语等称谓。顺治年间,东北大地的满语、蒙古语、辽东汉语涌入北京内城,此前各自独立缺少交集的语言在北京城街头巷尾相遇,京旗社会成为语言大熔炉,历时二百余年形成独具特色的京旗语言。京旗语言和北京民人语言不同,二者均属于“北京话”,这在清末属于共识;清末北京白话文运动尝试创造一种“参酌旗汉”,通行北京乃至全国的“京话”;“五四”之后,京旗语言逐渐独享“北京话”概念。胡适赞誉道:“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红楼梦》用北京话,……《儿女英雄传》也用北京

话;但《儿女英雄传》出世在《红楼梦》出世之后一百二三十年,风气更开了,凡曹雪芹时代不敢采用的土语,于今都敢用了。”^⑩梁实秋评论道:“老舍先生的小说之第一个令人不能忘的是他那一口纯熟而干脆的北平话。”^⑪“以道地北平土语写文章的人,在他以前也颇有几位。”^⑫按胡适、梁实秋等新文化人士的表述,京旗语言与“京语”“北京话”“土语”具有一致性。老舍《正红旗下》塑造了一位康熙、乾隆想象不到的北京旗人——福海:“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清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干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⑬京旗语言成为北京话,独享地域概念的话语权;“京腔”成为北京话“地方性”特征的显在标志,也是“京味儿”的特殊魅力。

清代京旗社会等级森严,不仅有平民阶层,更有世家贵族。语言作为权力的表征体现为京旗贵族与市井旗人的语言差异,以及同一旗人在不同社会场所操持语言的差异性上。福海的话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用的,里边有不少土话,歇后语,油漆匠的行话,和旗人惯用的而汉人也懂得的满文词儿。”“另一种是交际语言,在见长官或招待贵宾的时候才用。”“第一要多用些文雅的词儿,如‘台甫’,‘府上’之类,第二要多用些满文,如‘贵牛录’,‘几栅栏’等等。”福海喜欢第一种语言,“信口说来,活泼亲切”,不大喜爱第二种“拿腔作势的语言”。^⑭清末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作为自上而下的启蒙途径,预示平民阶层崛起,“白话”取代“文言”是新文化运动一大成绩,“白话”内部冲突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放大,平民语言(大众语、工农兵语言)开始冲击乃至取代贵族语言(包括文人语言)。老舍借福海之口道出京旗市井语言的优越性,既有自我阶层认同,也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老舍代表的京旗市井语言与日常

情趣奠定“京味儿”文学的“平民性”,规范了“京味儿”研究基本范式,同时遮蔽“京味儿”文化的贵族气质。路文彬以为:“‘京味儿’文化不仅仅是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百姓创造的,其实它更与皇城这一空间符码的存在本身息息相关。失去了这一符码,甚至整个‘京味儿’文化便失去了符码。”^⑮新时期以来,久被压抑的文化思潮回流,京旗贵族文化以多种形式在影视、学术、民俗等领域展露风姿。京旗后裔叶广岑借文学书写吐露心声:“当年金家的老祖母领着孩子们进宫给皇太后请安,也得讲官话,绝不能带进市井的京片子味儿。”“我们家是老北京人,却至今无人能将北京那一口近乎京油子的话学到嘴,我们的话一听就能听出是北京话,而又绝非一般的‘贫北京’、‘油北京’,更非今日的‘痞北京’,这与家庭的渊源或许有关。”^⑯叶广岑的《采桑子》《状元媒》以自己家族为蓝本,虚构宗室金家百年间兴衰况味,未必可以真实呈现北京府邸世家二十世纪历史命运,然而金家子弟坚守的“规制化、程式化、贵族化、完美化”的生活态度与时势万变而不失诗性本色的精神气质,是京旗精神在新时期的历史回响。叶广岑的家族小说延续了曹雪芹、顾太清、冷佛等京旗叙事传统,在文康、蔡友梅、老舍代表的平民叙事之外,形成一条绵延二百年的“京味儿”书写谱系。

城与乡是区域文化的基本构成。“京味儿”诞生之初,刘颖南、许自强等学者构建的“京味儿”理论已包含城、乡结构:“‘京味儿’既包含京都的城市味儿,市井味儿,也有京郊的农村味儿,农民味儿。由诸方面构成一个整体。”^⑰京旗社会由内城、京西、关厢三部分组成。京旗外三营——蓝靛厂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香山健锐营散布“三山五园”之间,与内城八旗遥相呼应。^⑱京西旗营远离内城喧嚣,生活简单、淳朴,具有田园风情。《儿女英雄传》中安如海原住内城东不压桥,搬到西山脚下隐居;老舍怀念的北京是从什刹海雨后的蜻蜓到京西玉泉山的塔影;“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不测。”^⑲关厢指驻扎德胜、安定、朝阳、

崇文等城门外的旗营,一方面缓解内城人口压力,一方面驻守城门。《老张的哲学》描写德胜门外的旗人社区;《状元媒》叙事者的母亲即朝阳门外南营房出身。一道城墙之隔,内城与京西、关厢在穆儒丐、老舍等京旗作家笔下有了城、乡之别。穆儒丐(1884?—1961)出身于香山健锐营,正蓝旗满洲,东北现代文学拓荒者,属于“乡下人”;他的《同命鸳鸯》《徐生自传》《北京》《如梦令》等小说聚焦香山脚下旗人命运,叙事视角随主人公足迹由乡下到城里透视北京中下层社会,与老舍“城里人”的叙事视角形成鲜明对比。老舍外祖父家,正黄旗满洲,“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⑧;白潞州是香山健锐营旗人,“有点乡下气”^⑨。祥子“生长在乡间”,偷了骆驼后“跑回海甸”,“找到静宜园,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甸去!”^⑩“回海甸”“到海甸”写出祥子的乡土认同,那里是圆明园护军营。^⑪老舍小说人物的活动场域主要在北京内城,但是祥子、老张、赵四、老李(《离婚》)等“乡下人”联系京旗乡间社会,是老舍文学世界富有意蕴的空白,与张大哥、祁老人、钱默吟等“城里人”平分秋色。老舍小说表现的“人与城”,应区分张大哥等“城里人”和祥子等“乡下人”与北京城的精神联系,忽略祥子的“乡下人”身份如同漠视北京文化的“三山五园”,难以领悟完整的京旗之味儿。

京旗文化是由贵族与平民、城里与乡村等构成的多元文化形态,因而形成多元一体的“京味儿”文化。当八旗制度成为历史,京旗社会转型为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老舍、叶广芩代表的“京味儿”是京旗文化的惯性延续,也是即将消逝的风景,终将在追怀中成为一缕文化乡愁,一曲时代挽歌。

二

有清一代,旗民并峙。顺治二年,原北京内城居民迁入外城(西便、东便、广安、广渠等七个城门圈为而成)。外城所辖城属区域以及京县(大兴、宛平)、京郊(宝坻、通州、三河、蓟县、武清等八县)所辖区域面积、人口远超“京旗”区域。北京民人文化包括城市

文化与农耕文化。北京城向来有内、外之分,外城由京城中轴线分成东西两部,“东半部多是商贾和土著汉人,西半部多是仕宦和寄籍士子。”^⑫西半部旧称宣南,萃集各省在京官僚、士子、伶人,会馆繁多,商业、曲艺、娱乐等行业发达,形成底蕴深厚的宣南文化。宣南文化是北京作为“帝都”/“京师”面相形成的侨寓文化,而非“地方性”的本土文化。辛亥之后,在京文人、学者的生活轨迹深入京旗社会,但是没有改变“外来者”侨寓本质。北京侨寓作家与本土作家生活在同一空间,却处在不同维度,看到的北京不尽相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陈慎言、张恨水、徐凌霄等作家将北京典雅、平和而不失紧张、焦灼的“旧都”气象流露笔端,营造出一个诗意绵长的文化北京;同一时期,穆儒丐、老舍、王度庐等本土作家书写的北京却是另一幅景象。北京侨寓作家的京城书写不属于“京味儿”范畴,“即使那些有意于‘北京呈现’的,也并不就是京味小说。”^⑬人们通常认为邓友梅的《那五》《烟壶》是新时期京味儿小说经典。邓友梅努力模仿的“北京话”很地道,塑造的那五、乌世保也符合世俗大众对八旗子弟的一贯想象,但是相关的“京旗”知识可能来自野史笔记、道听途说,错误、讹误比比皆是。那五的父亲福大爷“刚七岁就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那五》),乌世保“祖上因军功受封过‘骁骑校’”(《烟壶》)。“侍卫”“骁骑校”是八旗官职,“受封”的是八旗世爵世职,官职与爵位不分。乌世保是“火器营正白旗人”,即京西“乡下人”,府宅似乎在内城,“高兴时自称为‘它撒勒哈番’”,“它撒勒哈番”是爵位,汉译“云骑尉”,九级世爵位列第八,比末等“恩骑尉”高一级,两代便袭完,称不上“世家”。^⑭错误的“京旗”知识不可能准确讲述旗人故事,也不可能准确营造“京味儿”风格。北京侨寓作家的文学作品向来不乏旗人身影,如张恨水《啼笑因缘》、曹禺《北京人》、林语堂《京华烟云》,对旗人多有了解之同情,于没落的日常生活提炼一种诗意。邓友梅等作家在新时期执起“文化乡愁”之笔,由外向内考古发掘“老北京”的尘封往事,描绘“老北京”的

市井情趣,与文康、老舍、叶广岑等京旗作家由内向外自然流露的书写方式、审美风格大异其趣。邓友梅等“第二代”京味儿作家与京旗作家的“京味儿”书写不在一个文化轨道,而是北京侨寓作家京城书写的当代延续。而北京本土民人作家的地域书写是本节分析对象。

北京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均有特定北京话:金代的中都话,元代的大都话,明代的北京话。明成祖迁都北京,江苏、安徽、江西等地方言涌入北京地区,形成明代北京话。清代北京民人语言是明代北京话的自然流变。^⑧1901年黄中慧创办北京地区第一份白话报《京话报》,章程写道:

“本报既名京话,须知京话亦有数种。各不相同。譬如南城与北城,汉人与旗人,文士与平民,所说之话,声调字眼,皆大有区别。……本报馆特聘有旗员及南北城各友,互相审定,……务取其京中通行而雅俗共赏者始为定稿。”^⑨

《京话报》“章程”指出北京话的区域性、族群性、阶级性等差异,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1904年)也循此例,强调共性,淡化特性,追求一种“京中通行而雅俗共赏”的“京话”,不独崇北京任何语言形态,因此称清末民初京旗作家创作的小说为“京话小说”,似不妥当。清末在京的外国人也发现北京民人和旗人的“土语”,“虽同在北京,但因地之东西,处之南北,其语言多少都有些不同,音调亦不相同。”^⑩石继昌讲:“在语音方面,同是京味,外城的汉族比内城旗人显得轻柔一些。”^⑪直到1980年代,“北京郊区的人,特别是东郊通州一带的老人,至今仍认为北京话与山西洪洞话有因缘。”^⑫北京民人语言与京旗语言沿各自语言系统演变,相对独立而同中有异,都具“京味儿”风格;本土作家以外城、京郊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同属“京味儿”范畴。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推出的“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和2018年北京大学整理出版的“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都收录了损公(蔡友梅)、冷佛、穆儒丐、庄耀亭、杨曼青、陆瘦郎、徐剑胆等北京

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其中陆瘦郎、徐剑胆便是非旗籍作家。

陆哀(1880-1936),本名敬熙,字慎斋,笔名瘦郎,祖籍浙江,宛平人。父亲陆钟琦,曾任载沣教师,1911年10月由江苏布政使调任山西巡抚。次兄陆光熙,光绪进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授编修,擢翰林院侍讲,随父上任,逢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率新军在山西起义,陆家惨遭灭门。陆光熙之女陆士嘉尚在襁褓,被仆人(或母亲)救出,幸免于难。长兄陆仁熙蹈海自杀。陆敬熙遭此巨变,更名陆哀。陆哀曾任上海《新闻报》《神州日报》驻京记者,民初与章士钊合办《甲寅》日刊,任主编,后来接管《群强报》。前半生风流倜傥,后半生狷介傲物,不求仕进,日醉于鸦片烟,57岁去世。陆哀擅长政论、社评、戏评,词锋犀利,笔调酣畅,深得时人赞赏。《陈七奶奶》(1913年)是其目前仅见的一部长篇小说,揭露了共和初期外城私娼现象与官场腐败,属于清末民初流行一时的实事小说(即黑幕小说)。《陈七奶奶》的文学语言清新流畅,“京味儿”风格鲜明。1990年代末,弥松颐在《北京晚报》开“京字儿夜话”专栏,即以《陈七奶奶》为例介绍北京话方言属性。试举一例,领略《陈七奶奶》的语言风格:

红宝……说道:“我看这雨,下得是不会住了。今天总是活该。”说至此,用手指著贯村道:“是你的好造化。我与你们成全到底。二姑娘今天反正亦是不能走的了。论说头上末下的,可是没有这种办法。看得我们老娘们太没有骨气了。不过有一层,大家都不是外人。谁亦知道谁的。早晚总有这一天。你就谢谢老天爷,这是老天爷给做的媒人。你可不要没良心,到手三天半的新鲜,就把我们扔在脖子后头,那时候我可不同意。今天这是我硬与你做成的,你将来不要把送殡的埋在坟里就得了。”^⑬

红宝的语言泼辣而不失俏皮,这种书写与同时期蔡友梅、尹箴明等京旗作家的文学语言风格大异

其趣,属于北京民人语言。京旗社会流行的敬称“您”在京旗小说中常见,《陈七奶奶》无此用法,可能直到民初“您”字仍未进入北京民人语汇。

徐剑胆(1871-1948?),名济,字仰宸,笔名剑胆、自了生、亚玲、哑铃、涤尘等,生平不详。清末投身北京报界,担任《京话日报》《正宗爱国报》《爱国白话报》《实报》等白话报主笔,现存小说二百多部,“堪称报界小说权威者”。^⑤徐剑胆的“京味儿”作家身份已成共识,族群身份却有异议。满族文学研究者通常将徐剑胆列入清末民初京旗作家群,但是缺少相关佐证。徐剑胆清末居住内城松树胡同,靠近外城,“每天准到前门外来走一趟”^⑥,辛亥后定居宣南西草厂胡同,家世背景与京旗、宣南文人均有联系。1913年徐剑胆为《燕市积弊》作序,落款“仁和徐仰宸”,1935年出版《阔太监》,自序落款“仁和徐剑胆”,籍贯认同浙江仁和。如果徐剑胆是旗人,民初或保持旗籍,或落籍大兴、宛平某县,例如好友张醉丐是汉军旗人,署名“宛平张醉丐”^⑦。老舍也落籍宛平。徐剑胆应与彭翼仲(浙江)、梁漱溟(广西)、梁实秋(浙江)、凌叔华(广东)相似,祖上某辈进京,非旗籍也非北京民籍,而属原籍,但与祖辈侨寓经验不同,他们在北京生长,操持语言、生活习惯已本土化,属于北京民人作家。徐剑胆小说取材广泛,通常聚焦北京中下层市民社会,描写了卖野药的贾脖子、地痞碎催张傻子(《贾脖子》),前门外鲜鱼口摆带子摊的王树堂、卖麻花的李辫子、鲜鱼口天庆洗澡堂的孙胖子(《锯碗刘》)等底层民人群像。京旗作家通常聚焦北京内城,徐剑胆笔下人物的活动场域则多在外城,偶尔涉足内城,《花鞋老成》等描写旗人的作品,语言风貌、精神气质也与京旗小说明显不同。或许也正因此,满族文学学者研究徐剑胆多限于生平考证、创作概况,尚未进入徐剑胆的文学世界。

陆衰、徐剑胆的小说描写外城中下层社会市井风情,城市文学特征鲜明,然而“京味儿”是“开放的、有相当概括力的概念”,“写京郊的农民生活、写具有帝都郊区特色的风土人情,也应该允许纳入这个领

地”。^⑧1989年,刘颖南、许自强编选《京味小说八家》,收录了刘绍棠、浩然两位京郊出身作家的作品。刘绍棠的家乡通州儒林村,“本是清朝王公贵族跑马占圈的领地,讲北京土话,穿衣打扮,生活习惯,风俗礼节都是‘京派’”。^⑨京畿五百里的王庄、旗地是京旗文化与民人文化交汇带,京郊农耕文化多少带有帝都气派。刘绍棠擅写京东北运河一带农村生活,《花街》《青藤巷插曲》等小说以清新流利的文人语言融会提炼后的乡间土语,“描绘一幅幅乡土风俗画”,“谱写了一首首田园抒情诗”。^⑩京门野趣是刘绍棠小说的“京味儿”特色。浩然祖籍宝坻,童年在蓟县度过,成年在三河县生活,一生心血倾注于书写农村,是地道的京郊乡土作家。《艳阳天》《苍生》等作品描写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京郊农村社会巨变,表现农民在大时代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浩然的文学语言朴实无华,“是京郊农民丰富多采的生活语言的提炼和加工”^⑪,富于泥土气息。与刘绍棠小说浪漫清新的格调相比,浩然小说富于现实主义色彩。刘绍棠、浩然小说填补“京味儿”文学的京郊乡土题材,值得重视。

清代旗民分治政策将北京地区分隔成相对独立又彼此依托的京旗文化、北京民人文化与京师侨寓文化、西方殖民文化(东郊民巷),在旗人与民人、本土与外地、中国与西方的博弈中追求均衡,形成旗人北京与民人北京,“土著”北京与首都北京、国际北京的矛盾统一体。北京学界、文坛在新时期畅谈“京味儿”,考古式发掘北京“地方性”文化,折射出的是外地文化、全球化冲击下的“地方性”焦虑。老舍、叶广芩代表的“京味儿”风格是京旗文化现代转型期的艺术结晶,是京旗社会解体后的历史延续,然而八旗制度已成历史名词,“京旗”之味儿终成绝响。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民人文化在学界视野内长期被老舍代表的“老北京”与周作人、张恨水、林语堂等书写的“旧京”遮蔽。如今北京内、外二城并为一体,宣武、崇文成为地铁标志,大兴、通州等京县融入北京市,北京民人传统文化在城镇化、都市化进程中飞速消

逝。在“旗民”视野下分析北京地区“地方性”审美风格,结论可能令人遗憾:老舍、叶广苓与陆瘦郎、徐剑胆代表的“京味儿”风格将一逝不返,刘绍棠、浩然代表的京郊野趣可能尚存一席之地。王朔代表的“新京味儿”标志北京“地方性”书写开启“换味儿”时代。随着普通话普及与全球化时代袭来,北京“地方性”特性逐渐为共性取代,“换味儿”周期越来越短,频率越来越快,“京味儿”书写面临新的挑战 and 新的机遇。

注释:

- ①①舒乙:《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文史哲》1982年第4期。
②④⑫⑲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第212页,第18页,第19页。
③苏叔阳:《北京话与老舍》,《最难品味是人生》,中国盲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⑤⑦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第1页。
⑥⑩路文彬:《老舍与“京味儿”文学的未来生长空间》,《历史的反动与进步的幻象》,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第108页。
⑧参见韩光辉:《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
⑨文实权:《北京居民贫困之原因》,《爱国白话报》1921年1月6日。
⑩⑳㉓石继昌:《春明旧事》,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第125页,第125页。
⑬刘大先:《八旗气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1840-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39、122页。
⑭胡适:《〈儿女英雄传〉序》,《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382页。
⑮梁实秋:《读〈骆驼祥子〉》,《中央周刊》第4卷第32期,1942年3月20日。
⑯梁实秋:《忆老舍》,《梁实秋文集》第3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页。
⑰⑱老舍:《正红旗下》,《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页,第556页。

- ⑲叶广苓:《采桑子》,北京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20页。
⑳④⑫康式昭、李世凯:《“京味儿”和浩然小说——一些零零星星的思索记略》,载刘颖南、许自强编:《京味小说八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467页,第467页,第475页。
㉑三山五园:三山指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五园指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圆明园。
㉒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㉓老舍:《我的母亲》,《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㉔老舍:《记涪洲》,《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㉕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㉖见付立松:《老舍与清末民初京旗作家群文学渊源考论》,《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㉗邓友梅:《邓友梅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245、246页。
㉘参见常瀛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㉙《京话报》1901年8月15日。
㉚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474页。
㉛爱新觉罗瀛生:《满语杂识》,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页。
㉜陆瘦郎:《陈七奶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页。
㉝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28页。
㉞剑胆:《义和拳》,《实报》1930年7月21日。
㉟徐剑胆:《序文》,《青年》,华龙印书馆1940年。
㊱刘绍棠:《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㊲张同吾:《京门野趣,运河风情——刘绍棠小说的地域特色》,载刘颖南、许自强编《京味小说八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页。